

健康对 中国经济不平等 的影响

田艳芳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序

公平是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收入公平是事后意义上的公平，而健康和教育属于事前意义上的公平，是社会成员在机会上的公平。为了扩大机会，政策的着眼点需要放在提高基本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上。旨在消除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中，教育和健康公平都应该优先予以考虑。

以往研究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不平等影响的文献重点都放在教育投资上。健康状况由于受到个人基因、生活习惯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也由于健康度量方法的困难，数据的不可得和健康与经济不平等关系的复杂性，使得这方面的研究不充分。经常用来衡量健康的一些总合指标例如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不仅不能反映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甚至会掩盖经济不平等的现状。本书使用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健康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并评估中国在健康公平追求中的真实效果。

本书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在对经济不平等和健康差异状况作出统计分析后，以个人健康状况对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为中介，分析健康状况对个体经济地位差异的影响。本书研究发现健康是造成个人之间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原因之一。个人的健康资本存量会随着年龄增长和人体的自然衰老而逐渐贬值，还会因疾病而急剧贬值，但是也可以通过健康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健康投资的公平性尤其重要，个人健康投资差异应由政府的公共投资弥补，以缩小健康不平等进而缩小人们之间的经济不平等。

目 录

序	001
一、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	001
(一) 经济增长加剧社会不平等	001
(二) 包容性增长	002
(三) 扩大机会——建立更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	004
(四) 不容忽视的健康资本	005
二、中国经济不平等状况	007
(一) 就业不平等	008
(二) 收入不平等	014
(三) 教育不平等	019
(四) 健康不平等	024
三、经济不平等的原因	032
(一) 非人力资本因素	032
1. 经济增长模式选择	032
2. 政策选择	034
3. 制度设计	036
(二) 人力资本因素	038

1. 教育和培训	039
2. 迁移	041
3. 健康	043
四、健康和经济不平等	045
(一) 健康的概念和度量	045
(二) 经济不平等对健康的影响	053
(三) 健康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055
1. 健康的劳动市场效应	055
2. 健康对就业的影响	057
3. 健康对工资和收入的影响	060
4. 健康的教育和婚姻效应	063
五、健康状况和健康不平等分布状况	067
(一) 居民健康分布情况	069
(二) 健康不平等状况	072
1. 健康集中曲线	072
2. 健康集中指数	073
3. 健康不平等分解	075
4. 健康不平等变动分解	080
六、健康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082
(一) 健康对就业的影响	082
1. 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082
2. 健康状况对工作时间的的影响	092
(二) 健康对工资率的影响	098
1. 估计方法	098
2. 健康对工资率影响的验证	102
(三) 健康对工资不平等的贡献	107

1. 测算方法	107
2. 可添加的解释变量	111
3. 经验分析：健康对工资不平等变化的贡献	112
(四) 健康对教育的影响	115
七、健康投资的再分配效应	117
(一) 卫生支付的再分配效应分解方法	119
1. 卫生筹资公平性指数	119
2. 卫生支付的垂直不平等	120
3. 卫生支付的水平不平等	121
4. 再分配效应度量	121
(二) 我国 1989—2009 年卫生支付的再分配效应分解	123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28
(一) 研究结论与展望	128
(二) 政策变迁与政策借鉴	128
1. 我国公共卫生政策变迁	128
2. 他山之石	130
(三) 政策建议	141
参考文献	144

一、高速增长的背后

（一）经济增长加剧社会不平等

人们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凸显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进而引发和加深了更多的社会矛盾。在一部分人富裕的背后还存在着更多人的穷困。透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是更多的社会福利支出转移到由普通家庭来负担。家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新增的开支不断增大，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不能在国民福利上体现出来。因为这种经济增长一部分是以国民福利的牺牲为代价而换来的。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中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自改革以来大为改善。但是总体福利的增进并不意味着福利分配不存在问题。与总体福利改善得到一致认同一样，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平等地为每个人所共享也是另一个得到一致认同的观点。同一个调查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状况；87%的受访者认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其中48%受访者认为是极其严重的问题）；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成功归因于努力工作。^①

^① 数据来源于2012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in China，该调查自2012年3月18日—4月15日，覆盖中国三大经济中心区域，20多个城市，选取3177名调查者面对面访谈，其中城镇户口为55%。

缺少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经济的真正发展。正如 20 世纪初美国政治家亨利·乔治 (Henry George) 所说:“如果经济增长只是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 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 它也难以持久。塔楼在基础上倾斜了, 每增加一层只能加速它的最终崩溃。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①

经济不断增长, 社会矛盾丛生, 收入差距过大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 而为了社会稳定, 政府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方面采取了许多政策。政府在分配上的工作其实有两个: 一是维护合理的收入分配, 二是保证每个人都有培养和发挥能力的机会, 即机会平等, 尤其是人力资本获得上的平等, 即教育资源和健康资源上的平等。

社会公平是关系到生命与死亡的问题。它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生病的后果以及过早死亡的风险。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的预期寿命和良好健康状况持续增加, 其中包括中国, 但是绝对数量的增长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苏迪·阿南德 (Sudhir Anand) 和马丁·拉瓦雷 (Martin Ravallion, 1993) 的一些统计很有意思。他们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的确发现寿命期望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显著的正相关, 但是这一相关关系主要是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对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 (1) 收入, 特别是穷人的收入; (2) 公共支出中专门用于医疗保健的那部分。事实上, 当将贫穷和医疗保健公共支出单独列出作为两个解释变量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寿命期望值的联系看上去就完全消失了。因此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使用及分配。

(二) 包容性增长

保证普通民众都能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 中国的发展战略应重视以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包容性增长——亚洲开发银行在其举办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 (inclusive growth) 这一概念。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在过去 30 年中, 中国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

^① [美] 亨利·乔治著:《进步与贫困》, 吴良健、王翼龙译,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降，但是与此同时，基尼系数也显著上升。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1年的0.31上升至2004年的0.47。城乡及地区间收入的不同步增长，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1985年至2005年间，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

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分享性仍然有待改进。亚行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一方面，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增长才能创造就业及其他发展机会；但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必须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并保证享受这些服务和设施的机会均等，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够获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而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实质所在。

促进机会均等，需要对教育、卫生、医疗及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方面进行投资，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发展潜能；还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极端贫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指的是不能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经济增长应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现在的问题是它如何影响人民的生活，怎样让人民更富有，生活的质量更高，以及让人民拥有更多的经济活动自由。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每个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包容”意味着很多人都受益于“经济增长”中产生的公共资源，而这些可以用作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等。经济增长应该被诠释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发展的深入，这些都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更多人群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即使仍有一些人还没能立刻从经济中获益，我国近十年来的发展充分证明了公共资源可以被用来推广教育和医疗保健。

所以，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利用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去发展社会服务事业，如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其他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

（三）扩大机会——建立更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

世界银行 2007 年报告中指出：“赋予每个公民机会平等，要求国家创造尽可能多的赚取收入的机会和培养出能够利用这些机会的人力资本。为了培养人力资本，就需要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卫生保健，特别是为儿童提供基本技能和健康的基础。因为青年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的脆弱年代里，面对着众多的健康威胁。青年人的学习能力要比年纪大的人强得多，一旦错过了掌握技能、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机会，重新弥补的代价将十分高昂。而且青年人人力资本的成果又将会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通常有更少、更健康 and 受到更好教育的孩子。从长期来看，这种代际之间的传递有助于缩小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帮助一些家庭脱贫。”

虽然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往往可以缩小学习成绩、健康状况和收入方面的结果不平等，但政策并不能保证完全的结果公平。因为个人偏好、天赋、努力程度和机遇不同，即使机会完全平等，结果也总是存在差别。结果当然重要，但机会的质量同样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公共政策的中心应该是资本、机会和政治发言权的分配，而不是直接干预收入不平等。

合理的政策应该是通过增加对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公平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信息和市场，从竞争环境的公平化入手，促进从“不平等陷阱”向平等和发展的良性循环转变。这种政策比最低工资制度等直接干预收入分配的政策更加有效，也是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方法。因为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只能保证贫困人口一定的生活水平，并不能缩小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之间的能力差别和机会差别，对于缩小他们之间收入差别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以往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集中在教育投资上，健康由于受到个人基因、生活习惯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与政府公共政策关系不大。在研究中，也大多忽视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的作用。而以往经常用来衡量健康的一些总合指标例如死亡率、预期寿命等，并不能反映出那些会对人们今后的健康产生风险的生活习惯。

（四）不容忽视的健康资本

尽管“健康是一种权利”，是人的基本生存权，但是由于部分可用于健康的资源总是被分配到其他用途上，因此，“健康权”总是得不到充分的实现。从个人角度而言，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方式也违背健康原则；从国家角度而言，如何更好地提供医疗保健；如何更有效公正地分配医疗资源都是很重要的问题。经济学观点认为，资源是稀缺的，资源的用途又是多样的，因此个人和社会都面临选择。其中一种选择叫跨期选择，指人们需要决定当期消费还是未来消费，未来消费部分即是投资，这种投资既可以是实物投资，也可以是人力资本投资，健康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知道的不仅是人们有多少钱，还应该包括，他们怎样生活、他们的寿命、受到的教育、得到的医疗服务、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收入公平是在事后意义上的，而健康公平却是在事前意义上的，是一种社会成员在机会上的公平。在旨在消除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中，健康公平应该优先予以考虑”（Amartya Sen, 2002）。市场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条件就是所提供的机会可以被合理地分享。为了使这些条件得以发生，就需要有适当的公共政策（涉及学校教育、医疗保健等）来提供基本教育、普及初级医疗设施。甚至在极其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彻底的坚决的公共行动（Stern, 1989）。

由以上的背景可以思考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除了大家普遍关注的收入不平等，其他经济不平等状况如何，是否如收入不平等一样加剧？第二，为什么要重视健康投资，健康对人的经济地位有影响吗，如何影响？第三，中国健康不平等情况严重吗？第四，这种医疗卫生不平等状况是否影响经济不平等？第五，公共医疗卫生财政是否有效地调节了收入分配，缩小了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

现有研究已经证明，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政策角度来看，减少健康不平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不平等。通过加大

健康投资减少健康不平等成为一项可行的政策选择，这是因为个人健康资本存量会随着年龄增长和人体的自然衰老而逐渐贬值，但是也可以通过健康投资的增加而增加（Grossman, 1972）。健康投资在狭义上，主要指为了提高健康水平，在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方面所耗费的经济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居民或个人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投资者，健康正是投资所要的结果（Becker, 1987）。尽管健康投入由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组成，但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投入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朱玲，2002）。但是，在扩展的收入函数基础上，发现个人健康投资（预防保健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和公共健康投资（医疗机构床位数）都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收入不平等又是经济不平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经济不平等状况

一些人迫切的需要和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其他不很迫切的需要和需求则获得满足，这里令人大伤脑筋的不是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平等，我们思考的是除非存在着严重匮乏，否则起码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控制经济不平等是为了防止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使每个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当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它们就会倾向于支持政治的不平等。正如密尔所说的，政治权利的基础是（受过教育的）智力、财力和联合力。所谓联合力是指在追求自己的政治利益时同别人合作的能力。这种权力容许一小部分人依靠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来制定使他们在经济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法律制度和财产制度。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通常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连接在一起的，而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鼓励地位更低的人们将自己看作下等人，也鼓励别人将他们看作下等人，这样反过来又会加深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都严重不利。^①

在很多经济学研究中，对不平等所赋予的相对重要性都只局限于非常狭窄的领域，即收入不平等。这种狭窄性限制了我们从其他角度去看待不平等和公平。这对制定经济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确实，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贫困和收入不平等，而忽略了与贫困有关的其他因素，如失业、缺医少药、缺乏教育以及受到社会排斥等，以使政策辩论受到扭曲，不幸的是，

① [英] 约翰·密尔著：《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把经济不平等等同于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学中相当常见的现象，而且这两者常被当作实际上的同义词（阿马蒂亚·森，2002）。本书倾向于从就业、教育、健康和收入等更广泛的领域反映经济不平等现象，因为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

（一）就业不平等

许多观点认为就业的增长是由经济增长保证的，只要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就业会自动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吸纳了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就业。第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在198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只有2.9%，根据计算所得的调查失业率数据也大致如此，全国绝大部分省份的失业率都在4%以下。低失业率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包括“减员增效”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大批的下岗职工，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的人数从1995年的1.44亿人下降到2007年的6424万人。与此同时，中国的失业率也开始大幅上升，表2—1给出了1997—2012年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的数据。失业问题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的，由于用工制度改革前，企业不具有独立的雇佣决策，因此大部分企业都存在很严重的冗员问题，只是通过改革将冗员释放而已，加上宏观经济由短缺过渡到结构性过剩，所以虽然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但是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与就业情况恶化同时并存的情况。

要了解和理解当前就业状况，必须回顾一下劳动力市场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收入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收入应当等于工资乘以就业率，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从其内涵讲，工资包括劳动者个人维持自身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费；劳动者养育其家属和子女的费用；劳动者自身再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很显然，压低工资必须要保证劳动力生活费用的低廉，以及充分的就业概率。充分的就业率必须要降低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的迅速流动会导致岗位设置与劳动就业之间的不匹配。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意识到，引进在西方社会已发展成熟、并为苏联学习到的现代分工

体系对经济发展是关键的，但这一套现代分工体系超越我国当时的发展阶段，并不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所以必须采用非市场手段使社会生产要素流向有益这一分工体系的方向，这一整套体制与手段就构成“计划经济体制”（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计划经济的劳动力体制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低物价，低工资，低失业率，低流动率。

我们可以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视作一个均衡，这个均衡中每一环都是相互嵌入的，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化解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虽然收入比较低，但是物价也比较低，同时生活具有十分稳定的确定性，这样每个人不需要节衣缩食提高储蓄，收入转换成为支出和生活水准的比率比较高。人们虽然“夜无隔宿之粮”，但是由于失业率很低所以并不会与企业 and 政府发生激烈的冲突。然后由于大多数企业都具有政府背景，属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对于工资的兑付、社会福利的保障，都有着充分的信任，而且国家和社会也对工作环境有着一定的规定。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存在着一整套具有稳定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人们对这一社会保障体系有着充分的信任。

显然，稳定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可以提供稳定的成熟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公众也会对这种社会保障体制有着充分的信任。这些制度包括失业保险、工资报酬偿付制度、强制性的社会福利、劳动合同纠纷仲裁等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改革在80年代主要是采取“增量改革”，并没有打破原有的体制，所以80年代社会经济改革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对比较少一些。90年代以后在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市场经济劳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将社会保障责任由政府推向市场。这些问题甚至到今天仍然存在，例如2013年四大国有银行的解聘事件。

随着私营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国企陷入亏损，政府经济负担不断加重，为减轻负担政府不遗余力地采取了各种企业改制活动。但是，阻碍企业改制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失业。虽然全国不同省市尝试了不同的改制模式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自由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都尚未健全之前，这一阶段的改制打破了国企的“铁

饭碗”，随着国企产权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部分县乡级政府控制的国企荡然无存。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很低，1980年的年平均工资772元，1990年的年平均工资为2140元。这个阶段工作的人一方面工资水平低，因此储蓄非常低；另一方面工作和生活中不确定因素少，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方面国家包办，人们并没有预防储蓄动机。但是到1990年后，物价和工资水平迅速上涨，2004年的年平均工资为16024元。2000年以来，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按市场价格购买，此时就出现了价格与支付能力之间巨大的差距。一部分人因为年龄、技能、政策等因素在这个阶段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实际购买力水平不断下降；另一部分人现在的社会保障支出是用现在的收入水平来衡量的，如果用过去的收入来应对现在的社会保障支出则明显不足，因此需要用储蓄支付，当面临过去的储蓄过少与现在的支付过高这种矛盾时，劳动力市场就成为转型期迅速分化的市场，也是矛盾和冲突最为激烈的战场。

表2—1 中国经济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和城镇失业率（单位：百分比）

年份	经济增长率	登记失业率	调查失业率 ^①	劳动参与率 ^②
1997	9.3	3.1	4.50	75.93
1998	7.8	3.1	6.29	77.74
1999	7.6	3.1	5.87	77.50
2000	8.4	3.1	7.61	76.80
2001	8.3	3.6	5.55	75.25
2002	9.1	4.0	6.14	75.60
2003	10.0	4.3	6.02	75.57
2004	10.1	4.2	5.78	73.69

① 调查失业率 = 失业人口 / 经济活动人口，城镇经济活动人口 = 经济活动人口 - 农村就业人口，失业人口 = 城镇经济活动人口 - 城镇就业人口。

② 劳动参与率 = 经济活动人口 / 劳动年龄人口，其中劳动年龄人口为国家统计局最新规定的15岁以上人口。

(续表)

2005	11.31	4.2	6.98	74.70
2006	12.68	4.1	6.12	73.48
2007	14.16	4.0	5.33	73.87
2008	9.63	4.2	4.4	79.69
2009	9.21	4.3	4.8	79.51
2010	10.45	4.1	6.18	78.44
2011	9.30	4.1	5.67	78.36
2012	7.65	4.1	5.57	78.58

数据来源：登记失业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增长率、调查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计算。

从表2—1可以看出，在1997—2000年，全国下岗失业最严重的时期，登记失业率保持四年连续不变，因此登记失业率并不能如实反映失业情况。调查失业率远高于登记失业率，但是如果不考虑劳动参与率的情况，调查失业率也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状况。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由于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持续性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变化不大，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状况不容乐观。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同步增加。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过去的工业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在这一阶段遭遇下岗，工资与福利被削减或中止，并失去了养老金。在城市地区，失业率据估计平均在15%，在中国东北的一些城市，失业率甚至上升到了25%。

单从数据看和欧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失业率并不高，欧盟国家的失业率基本上都是10%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失业问题不严重，因为，在中国失业的统计对象并不涵盖农村剩余劳动力，更何况欧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失业的保险覆盖面较广，失业并不会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或危机。相比之下，我国的失业保险覆盖情况远远不能和

他们相比。虽然城镇职工基本上都纳入了国家失业保险，但是城镇职工并不包括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城镇从业人员和大量的农民工。从图2—1可以看出，在非农就业人员中，大约只有25%的就业者参加失业保险，这一比例基本稳定了十几年。而城镇就业人员中参保比例明显高于非农就业，但也只是在40%上下浮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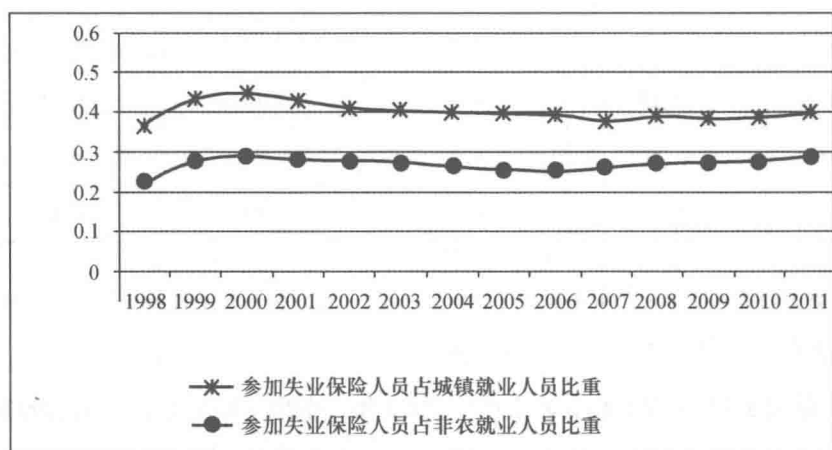


图2—1 中国失业保险覆盖情况

注：数据根据1998—201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

不仅覆盖面窄，收益面同样低。由于中国失业保险制度规定的领取失业保险补偿基本条件：一是按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及本人累积缴费时间满一年的；二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在这些条件限定下，中国的失业人员收益率（拿到失业保险金补偿的失业人员占总失业人员的比重）很低。从表2—2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失业保险收益率都不足50%，自2005年以来更是逐年降低。如果按照调查失业人员数，则失业人员收益率更低，最后一列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失业保险收益率不足1/4。绝大多数的失业人员处于无任何保障的状况。因此，一旦陷入失业状况，就陷入了无任何生活保障的境况。